

千古文章未尽才

——读陈乐民《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

文/张建智

提到陈乐民的名字，自然会和其夫人资中筠联系在一起，不少读者也是因先读了资先生的书，才了解到陈乐民先生。我在1979年创办的《读书》杂志上，就邂逅了陈先生。

陈先生五十年代初就在域外工作。九十年代，先生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研究中西之间的文章。如《坐视世界如恒沙：谈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念》、《哲学家的足迹和沉思——超越道德的忧虑》等。这些均关乎中西之间价值观论理的系列思想，触动了刚开放10多年的整个读书界。

这期间，有先生所著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记得，当时张弓先生说：“《读书》连续两期刊载鉴赏黄仁宇先生之历史观和历史方法的文章，足见作者之推崇及编辑者之青睐……令人担忧的是，黄先生这种超越文化土壤的历史观，可能给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隐患……”

现实中，我们面临的文化灾难，却源于自己的文化痼疾。陈先生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是西方文明通向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

尔后，先生发表《理性·人性·文人》、《行己有耻与文明意识》等文，阐释了横隔于中西之间精神层面的碰撞问题。

近读到毕飞宇先生一文，他曾向陈先生说，你没有资中筠出名早，陈先生只是“嗯、嗯了几声”。就我的阅读经历，读到陈乐民先生的文章，应该早于资先生。当然，他们俩一起写了文章、合著了书。如《读书》上的

《细哉文心：读宗璞“南渡记”》，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的《学海岸边》（陈乐民资中筠著）。

先生在《万象》上发表了系列“启蒙札记”。可以说他是中国知识界率先倡导“启蒙精神”的学者。2008年8月，已是在血透着的衰病之体，离世尚剩四月有余。他说“现在写‘启蒙札记’已经完成了二十四篇，还要继续写下去。也许直到‘那一刻’到来，怕也写不完。”

先生的著作，普通读者知之甚少，但在知识界一直保持着独特位置。

近日，陈先生女儿陈丰，赠我三联版《陈乐民作品》。第一集《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始读波澜不惊，而至40页后，却坐卧不安。待篇篇读下去，倒有点儿似他评宗璞之文，清新的、淡淡的，没有时下颇为时兴的“火气”，倒有点夏日里“冷开水泡茶”之味。“我素喜明代三袁和张宗子，习惯于含蓄的短文，不擅飞扬激越，总想把结论留给读者。”所以李慎之曾对他说：“你的文章太短、太含蓄，也就是我这样的人能看得出你的‘微言大义’，一般谁看得出！”

金克木说过，小时作文只恨写不长，到老来写文又怕写不短。

先生的这本书分三辑，一为“在中西之间”，二是“忆旧知”，三为“给没有收信人的信”。第一辑讲述了他的经历。“忆旧知”中，有和周恩来、董乐山、张芝联等人的故交。我认为，他对李一氓、李慎之两位之作风人格，思想学识特别难忘。如李一氓

晚年有《岁暮》一诗，他为之看重：西风彻夜不成眠，一梦迷离断欲连。旧事稍嫌频入梦，何如新梦逐时添。这里用了三个“梦”字，此诗，也从侧面反映了陈乐民那代知识者之心境，也只能以一个梦字了得。

从书中可读出，那代知识精英的人生是怎样崎岖。大量精力，耗散在不断的“运动”里。尔后，好不容易能做点学问，但“每每有一种‘时不再来’的紧迫感。觉得五十岁以前的二三十年‘浪费’了相当多的光阴，老老实实地做了许多无益之事，二三十年几乎没有‘自我’。”

陈乐民先生那一代人，从清华园走出来，原有自己的学术建构，想一步一步走去。然而岁月不饶人，元气已大伤，如陈先生直到患病至逝，还在做，尚无一日停息……

这是一个代人的命运。我想，他们走过的一生，总有一种谁也看不清的感觉。陈先生作为文化友好的使者，在国外工作，没有经历大不幸，只是不停地忙碌着。六十年来，曾经沧海，虽具士人风骨，家国情怀，可虚耗时日太多，终于大时代历史之中“劳心惨兮，道阻且长”。细想想，至少超越了老舍、傅雷、陈梦家等一代学人的悲剧命运。陈先生晚年，时感力不从心，未尽其才万事休。

通览此书，是陈先生于中西之间的一个总结。“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只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入流》的仿真与传说

文/孟繁华

余一鸣的中篇小说《入流》，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里的人物、场景、规则等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这个陌生的世界不是金庸小说中虚构的江湖，也不是网络的虚拟世界。余一鸣构建的这个江湖王国具有“仿真性”。小说中的每一处细节，几乎都是生活的摹写，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但小说整体看来，却在大地与云端之间——那是一个距我们如此遥远的世界。

这个江湖王国有自己的“潜规则”。白脸郑守志、船队老大陈栓钱和月香等众多人物命运，被余一鸣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这些人物命运的归宿中，隐含了余一鸣宿命论或因果报应的世界观。

我感受鲜明的是人的欲望的横冲直撞，欲望是每个人物避之不及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欲望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它在每个人的身体、血液和思想中，它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现代性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欲望的释放过程。1978年以前的中国，是欲望被抑制、控制的时代，欲望在革命的狂欢中得到宣泄。1978年以后，控制欲望的闸门被打开，没有人想到，欲望之流是如此的汹涌。这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和身体狂欢不计后果的集中表现。小说中也写到了亲情和爱情。但是，情在欲望面前纷纷落败。金钱和利益是永恒的信念，在这条大江上，郑总、罗总、栓钱、三宝无不为一个“钱”字在奔波和争斗不止，他们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最后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在江湖上最大化。因此，金钱是贯穿在小说始终的一个幽灵。

另一方面是人物关系的幽灵化：白脸郑守志是所有人的幽灵。小说中的江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白脸建构并强化的。在他看来，“长江上的道理攥在强人手里”。当他决意干掉罗总的时候，他精心设计了一场赌局，罗总在这场赌局中彻底陷落并淡出江湖；栓钱做了固城船队的老大，郑守志自然也成了栓钱的幽灵。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一个循环的幽灵化关系。这种互为幽灵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其间难以名状的“纠结”状态和严密的结构，是我们阅读经验中感受最为强烈的，这构成了小说魅力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余一鸣的写实功力。他对场景的描述，气氛的烘托，让人如临其境置身其间，人物性格也在场景的描述中凸显出来。

还有一点，是余一鸣对本土传统文学的学习。在他的小说中，有《水浒传》梁山好汉的味道、有《说唐》中瓦岗寨的气息。这个印象，我在评论他的《不二》时就感受到了。这些笔法在《入流》中有进一步的发挥。比如小说对白脸编织毛衣的描写，他的淡定从容和作家的欲擒故纵，都恰到好处，使小说的节奏张弛有致别有光景。■

杜高：配得上自己受的苦难

文/石湾

1998年，青年学者李辉在潘家旧货市场奇迹般发现了杜高的历史档案。2004年，他出版了《一纸苍凉：杜高档案》。杜高在看到了李辉所收藏的这份档案后，写下回忆录《又见昨天》。两部书面世后，引起了知识界的广泛关注。那年8月，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想起路翎的一部书稿》，引用了杜高《又见昨天》中的一段话：“我比路翎年轻近十岁，我的脑神经也没有受到他那样的致命伤害，但我也是许多年都摆脱不了那种囚徒的恐惧。我在80年代初期所写的那些文字和路翎那些不能发表的小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正是智者启迪我们的：‘世上最可怕的，莫过于精神的死亡和精神奴役的创痛。’”

杜高读到此文后，随即给我打电话，说要不是见到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发现的他的个人档案，他也不会对自己的心灵有如此冷峻的拷问，彻底省悟过来。几天后，我与他在一次文学活动中见面，遂结为忘年交。今年5月，蒙他的信任和作家出版社老同事的委托，做了他的散文集《生命在我》的特约编辑。

书中讲到，2007年，已定居澳大利亚的丽江先生回国来找他，说李辉发现的杜高档案原始文本还有一些文件缺页，仅占他劳教岁月的三分之一的篇幅。丽江先生向他提供了1997年也是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所购得的封皮盖有“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农场”圆形公章的厚厚一册档案材料，让他见到了更多血泪斑斑和触目惊心的内容。这其中，最不堪回首的场景是：1958年4月18日，“我们就被

送到公安局东单分局。到东单分局干什么呢？是让我们两个手掌都摁上黑色油墨，留下我们的手掌印，这就是犯人档案，因为每个人的指纹掌纹是不一样的。”

编辑过程中，杜高几次问我：“你看《生命在我》这个书名起得合适吗？”每次我都回答：“很好！”而在我看到那张摁有杜高指纹和掌纹的劳教登记表照片时，就更觉得这不仅是杜高生命价值的一个独特的象征，而且也是一个无法磨灭的历史印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55万人中，大都送去劳教了，但惟有杜高的指纹掌纹表没有被销毁，见证了那段惊恐岁月和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于是，我征询杜高的意见：“可否把这张世人从未见过的浓缩了他那段黑暗的人生经历的指纹掌纹表作为衬底，放到《生命在我》的封面上去呢？”他和美编都接受了我的提议。我相信，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的图书封面，定然会吸引广大读者，通过认知杜高的生命价值，去探究一代人的命运，对那段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共和国历史，作更深入持久的反思。

杜高原名李传惠，其父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他10岁时，父亲把他交给儿童演艺团体“新旅”。此后，他便追随田汉、欧阳予倩等进步的文化名人。早慧的他年少成名，12岁发表散文、14岁发表剧评。当时他之所以改名为“杜高”，是因为他把两位俄国作家当作了自己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他取两位大师名字的首音，合而为“杜高”。他把书稿交给我时，说：

“我用题记来替代序，你看行不？”其《题记》是：

“我时时记在心里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

书中，杜高不仅回顾了他几度死里逃生的苦难历程，而且也记叙了吴祖光、路翎、孙维世等作家、艺术家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他在《美被毁灭的悲剧——严凤英之死》一文中说：“当我们看完《严凤英》传记连续剧以后，我们正是从历史反思的痛苦中，燃起了对现实和未来的热情……”

《严凤英》的编剧是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该剧送中央电视台审看时，有关部门认为后3集调子低沉，要求砍掉。请时任中国电视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杜高审看。他看后认为后3集表现了美被毁灭的悲剧，极具艺术震撼力。他不仅仗义执言，而且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央视终于按原貌播出了这部尊重历史真相的优秀电视剧。

因他悉心扶植而起死回生或热播的，还有江苏台拍摄的《秋白之死》等电视剧。可以说，经历了苦难的杜高，复出后又回归成一个独具胆识并敢于担当的作家、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卓著的业绩和艺术成就，包括这部用血泪真情写成的《生命在我》，完全对得起他“自己受的苦难”。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地下有知，也会为有他这样一个忠实的中国“粉丝”而感到骄傲！■

陈乐民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杜高著
作家出版社